

## 跨文化对话是当代哲学的重要命题

——兼评《他者的智慧》

史忠义

跨文化对话是在政府间的外交对话和商务交流之外,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在人文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更深刻、更广泛、影响更深远、更切中人们的精神生活、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对话。人类发展史的各个阶段都需要这样的对话。但是,人类诞生之初以及诞生之后的漫长时间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并不具备这样的对话条件,对话条件是逐渐生成和发展的,对话的规模也是逐渐扩大和深入的。那时候,对话的匮乏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但自然界的开发程度也很低,各个民族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们经过自己坚苦卓绝前赴后继的斗争,终于一步步地走进了现代文明。如今,持续快速增长的信息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然而另一方面,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趋势,人类对大自然的超度开发和利用,全球人口的暴长,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市场和生产领域、在科学技术和军事领域甚至在空间领域的全面竞争,又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的扩大,自然资源的紧缺,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的增大和破坏程度的加剧等。而我们的世界仍然很不太平,区域性军事冲突不断,国与国之间的制度冲突、利益冲突此起彼伏,有些区域的民族摩擦和宗教摩擦愈演愈烈,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些威胁和现象都凸显了跨文化对话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

跨文化对话的根基是我们同属于一个星球,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有责任共同治理世界,否则,我们人类的生存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因此,跨文化对话其实是当代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理应对人类重大问题的智慧思考,而跨文化对话可以达到沟通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目的,

重新建构人类与自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和谐关系。那些挖空心思却找不到创新点的哲学家们,其实应该关注关注跨文化对话这种惠及全人类、惠及子孙后代的大事情。

从这个视野观照,法国学者米歇尔·苏盖(Michel Sauquet)和马丁·维拉汝斯(Martin Vielajus)的新著《他者的智慧》(*L'Intelligence de l'autre*)<sup>①</sup>是一部很有启发意义的著作。首先,这是一部感性的体会之作。主要作者苏盖先生长期从事跨文化工作,他从巴黎行政学院毕业后不久,即被派往埃塞俄比亚山区从事农业培训工作,后来又进入法国科技交流研究小组研究第三世界的科技发展状况,随后出任联合国驻巴西办事处的国际官员,1990至2006年主管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的出版工作,有长期的跨文化工作实践。在我与他的接触中,感到他是一个重实干而不善言辞的人,注重从实践中积累经验和知识。因此,这部书凝聚着他几十年的心得和体会。另一位作者维拉汝斯也是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合作者,曾对国际政治领域进行过跨文化的专题研究。他们的言辞当不是大言不惭的夸夸其谈或言之无物的空谈。所以著作中的内容是颇值得我们仔细体味的。

笔者之所以特别看重实践和感性体验,是因为现在有些学者严重地忽视它们。有些研究人员对一些重大问题毫无感性知识,就轻易地发出断然肯定或完全否定式的裁决意见。例如有人仅出访过西方国家两三次,只是跑马观花地看了看,前后不足三个月,从没有在西方的人民群众中生活过,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不了解西方国家两百多年的大概历史,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变化,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他对西方许多知识分子真心服膺马克思思想之深刻的现象也不屑一顾,摆出只有他自己掌握真理的架势,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岂不知这种思维方式和结论都是先验形而上学的。

还有学者把中西文化、中西文明视为异质文化和异质文明,把这种观点作为自己的理论创新。何谓异质?即性质相异。植物文明可能与动物文明性质相异(也不尽然,因为它们都归属于生物文明)。专门讲数百万年以前之地貌变化的冰川文明可能与人类文明性质相异。诚然,中西文化和文明之间有很多差异,但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不是异质的。

显然,在我们的时代,拥有跨文化意识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跨文化意识从何而来呢?一方面它当然可以来自前人和同辈学者的著作,但更来自长期的实

践。从实践中悟出的道理是切肤之感。跨文化意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长期实践的结晶。这些实践有愉悦,也有痛苦。

《他者的智慧》的另一特色是对文化、跨文化、相对主义、普世主义等许多概念进行了梳理,作者在梳理中也提供了自己源自实践的体会。著作还分析了各方为了获益或自我保护而采取的策略。这些章节使我们能够相对集中地了解许多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观念和态度。而这些观念、态度和策略凸显了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例如,作者谈到了列维-斯特劳斯和托多罗夫两位思想家。对于前者,我们过去多注意他的一系列人类学研究成果,而忽视他的全人类意识。笔者亦曾关注过列维-斯特劳斯的全人类思想。列维-斯特劳斯主张远距离地观察自己的文化,从其他文化的发展视野中认识自我,他把这种方法叫做“走出祖国法”(la technique du dépaysement,或走向陌生法)<sup>①</sup>对他而言,走出祖国法(或走向陌生法)并非仅仅是观察家的一种技巧或一种态度,它更标志着某些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力,一种有可能改变文明命运的能力:那些不会或不能通过其他文明反思自己的文明,已经或注定受统治或者被同化。这个逻辑隐含着某种报复意味:不了解或无视人类其他部分的人群将因此而失去他们自己在人类内部继续生存的必要手段。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有着很深厚的哲学蕴涵,也是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总结。

列维-斯特劳斯此举还意味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他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确实多次猛烈地抨击过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此后,种族中心主义一词主要是指西方国家以自己的文化为准绳评判其他文化的态度,亦指西方长期以来盛气凌人的霸权主义。但列维-斯特劳斯同时指出,其实,种族中心主义是所有民族的共同缺点,包括那些受西方支配、被称为“原始部落”的民族:“在人类的辽阔空间里,数万年内,(人类)这个概念似乎是完全缺失的。人类止于部落和语言群体的边境,有时甚至止于村庄的边境;大部分所谓的原始民族竟至于以相当于‘人类’的名词自诩……这就意味着其他部落、群体或村庄不参与人类道德甚至人类本身。”<sup>②</sup>列维-斯特劳斯的这个认识是源自感性的经验之谈。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深入考察过众多原始部落,而他从每个部落里实际上也都发现过自我中心主义。这个发现提醒我们,我们在理性审视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民族时,也要注意克服自己的民族中心主义。我们应该从全人类的视野,从人类所有文明史的视

<sup>①</sup>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巴黎,普隆出版社,1958年,第320页。

<sup>②</sup>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Ⅱ》(*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deux*),巴黎,普隆出版社,1973年,第384页。

<sup>①</sup> 法文原作:2008年发表。由刘娟娟、张怡、孙凯翻译的中文本2008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野,从全人类发展方向的视野,思考和认识我们面对的种种问题。它不仅要求我们在不同文化和文明间进行深层对话,更要求我们从全人类所有文化和所有文明史中融会贯通而出;它颠覆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的所有文化和所有民族都潜存的种族中心主义价值。

对于托多罗夫,中国学术界似乎更关注他的文学理论,而对他后来在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关注不够。其实,他后来的思想更深刻,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很多问题都很有启发。托氏的著作之一《我们与他者》(*Nous et les autres*),集中展现了法国传统是如何探讨民众的多样性与人类的统一性的关系的。

《他者的智慧》的第二部分从跨文化视野,即既从他者的视野,也从我们的视野,审视了许多重大问题,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宇宙观、人类的环境观、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时间观念、财富观念、权力观念、等级观念、贫富观、平等观、民主观等。围绕这些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给予不同的理解。自以为是的态度往往产生许多误解。这一部分的内容很丰富。理解与误解的碰撞,针对具体问题的个案分析,都给我们以这样的启发,即他者和他者的文化其实也蕴涵着卓越的智慧。尽管文化上有差异,这些民族与西方之间,他们的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恰恰没有根本的不同。不管是在亲缘网络的建构中,还是在自然物种的区分中,在神话叙事的组织中,其精神与我们最深思熟虑、建构最严谨的科学形式中的精神是一致的,是同一种精神,逻辑相同,类别相同,秩序和严谨的要求也相同。在根本性质的层面上寻找差异是不恰当的。我们应该尊重和理解他者的智慧。这些分析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理解人本身,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他者的智慧》的第三部分论述了跨文化对话状态中的语言元素,语言与语词的玄机,言与不言的奥妙,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性,不同语言建构方面的差异,不同语言表述思想体系时的差异,语境对语言效果的影响,文字与口语的关系等等。这里的特点也是经验之谈。

《他者的智慧》是在法国治理与研究学院的讲稿的基础上整理扩展而成的,即将赴异域从事文化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是作者心目中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体。从大的方面讲,他们的职业取向与作者的实践相吻合,所以著作在实践层面上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更深入的专题研究的层面上,作者也提供了若干案例和参考书目,以开启未来的学术研究。例如通过解读文化隐喻来理解多种文化;又如比较五大宗教在多种问题上的观念和实践,从而深化对这些宗教的理解等。这些案例无疑会产生种种出人意料的效果。

《他者的智慧》也有明显的薄弱环节,如对跨文化语境下国际政治生活的思

考。这一部分是维拉汝斯写成的。作者主要思考了“民主”、“公民社会”和“公民性”三个术语,三个术语之间的基本思想是互相关联、互为基础的。这三个术语当然很重要,但作者的思考并非很深刻。笔者以为,当今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及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国际政治的新秩序问题;三是健康人性的建设问题。发展问题的重心是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另一重心是确立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遏制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转基础解决好了,生产力发展的前景应该是光明的。尽管当前碰到了金融危机,但全球团结起来应对它,危机过后人类将增加新的智慧,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建设就更牢靠了。非洲的生产力发展也会逐渐跟上来的。而后两个方面则问题很多。国际政治秩序方面,“二战”以后虽然有很大进步,但我们的世界仍然很脆弱,区域性战争不断,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似无停息的迹象,大国之间的利益争执和强权政治的迹象仍然很突出,南北发展的失衡 2007 年虽然首次出现了下降趋势,但仍然是一条巨大的鸿沟,等等。这些问题影响着人类的现在和未来。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古代即有“大和”和“太和”理想社会的思想。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中这类思想资源也很丰富,如比利时政府某部的格言“让我们聚同联异”,如欧盟的口号“在多样性中团结”,又如安第斯山脉土著人文化中的“我们”和“亲属”概念。“我们”不仅包括了人类,还扩展到活在这个可见世界和那个不可见世界的生物。而“亲属”(ayllu)则由人类(runas)、自然界的元素(salqa)和神界的成员(huacas)组成;“亲属”的含义也被延伸到种植的作物(chacra)身上。由于万物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所以安第斯山土著人文化的“亲属”概念中没有孤儿,也没有孤独概念,爱代替了孤独。作者可以从建设和谐世界新秩序的深度更广泛地挖掘多种文化的资源和进行思考。

人性方面暴露出来的脆弱是近年来一个国际现象。如巨额洗钱案;如不计其数的政府高官因巨额贪污和受贿而被拉下马来;如金融等经济要害部门的贪得无厌者人数之多令普通人瞠目结舌;如官商勾结竟然在直接关涉人类健康特别是婴幼儿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上作祟,伤天害理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草菅人命等等。社会发展了,生活富裕了,钱多了,人却似乎比以往更堕落了。我们归根结底又回到了数千年的古老话题:人性的善与恶。中国古代的孟子相信人有能力向善和行善并影响他人,而荀子则以为人性本恶,后天的强行规范更重要。英国 17 世纪的哲学家霍布斯似乎也持性本恶论,对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性恶表现给予了猛烈抨击。18 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代表作《人性论》和其他著作,更注重从科学角度考察人性。笔者以为,“人之

初,性本善”是有相当道理的,后世的影响很重要;现实生活中的人性有善恶两面性。从这个角度讲,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中的“习”字概念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习性”(habitus)概念以及近年来在多种学科特别是文化社会学中颇为时尚的“场”概念是相通的。今天我们思考人性,与过去的政治教化或道德教化不同,是立足于健康人性。善恶的评定往往带有政治立场的影响,而健康人性则是更基本的人性,锻炼健康人性的方法也更广泛,如体育、娱乐、文艺活动、奥运会、残奥会,如国情调研,如贫困地区的考察,或异域文化的考察等,都有助于铸造健康人性。广而言之,铸造健康人性是人类的根本大计,锻炼健康人性的方法也更人性化。显然,在这方面,作者也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卡蓝默先生以第二次中欧论坛为例,总结了跨文化对话的五大优点:承认每个社会每种文化内部的多元性;解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把大家都集合于“我们”的旗帜之下;镜子效应,即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都有必要借助于对他者的倾诉,来深化对自己的认识;发现新的思维模式,发现可以丰富我们思想的新经验,发现多种可供考虑和选择的解决办法;以民主的方式认同全球共同生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遗憾的是,中外学术界对跨文化对话还有一些糊涂认识。有学者错误地认为,在自己学科无所作为的人才选择比较研究和跨文化对话。有学者甚至调侃跨文化的对话研究是“单打不行才搞双打或混合双打”。事实上,近代中外的学术家们几乎都有跨文化或跨学科的背景。在学科界限严格的国内学术界,跨学科跨文化方面的研究课题常常无人受理,面临两边都可能评不上的尴尬处境。我们的学术体制显然落伍了。法国著名学者托多罗夫 2007 年秋访问中国时的突出印象之一,就是中国学者的学术比较单一。确实,世界上每天都有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墨守成规就会被动和落后。

2008 年 10 月,北京